

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

——兼答朱光立先生

○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唐张旭无文集传世,其诗散逸于诸书,其中《桃花溪》等三诗与宋蔡襄集中三诗基本雷同,从而产生著作权争议。而《桃花溪》又入选《唐诗三百首》。有学者极力论证三诗应属蔡襄,但论据和论证逻辑皆存在问题。本文又提供一系列新证据,结合以前全部正反证据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当归张旭。《升庵集》所载张旭的草书石刻,可视为三诗原貌。北宋文人普遍有手书、模仿、改写甚至剽窃唐诗的风气,蔡襄对其偶像张旭的诗帖有收藏、临摹、题写等行为,遂致《桃花溪》等三诗“误入”蔡襄文集。

〔关键词〕再论;《唐诗三百首》;张旭;蔡襄

一、论争缘起

唐张旭无文集传世,其诗散逸于诸书,其中《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诗,与宋蔡襄集中《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三诗题目虽全不同,但正文基本雷同。^{〔1〕}自南宋王十朋乾道五年(1169)编《蔡襄集》收入此三诗后约五百年基本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直到清康熙年间对于此三诗归属产生两次大争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蕲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收入张旭《桃花溪》一诗,其后两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质疑。

2001年莫砺锋先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2〕}(以下简称“莫文”),论证清编《唐诗三百首》中所选张旭的名篇《桃花溪》实为误收宋朝人

作者简介:李定广,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与诗词学。

〔*〕本文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批准号12&ZD154)成果。

蔡襄所作的《度南涧》，笔者在2007年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一文^[3]（以下简称“笔者前作”），认为莫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张旭。2014年朱光立先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一文^[4]（以下简称“朱文”）与我商榷，回护莫文。学术有论辩是好事，问题总是越辩越明。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欢迎他人提出异议的。我很感谢朱文指出我文章中的问题，如指出拙文对杨慎的文献成就评价过高，指出拙文没有提到陈思《两宋名贤小集》，这两点指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我有所启发。但总体上看，朱文并没有在莫文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新证据，其对笔者前作的批评以及所谓“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实在没有说服力，倒是有强词夺理、“为辩护而辩护”之嫌。既然如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再作回应，同时增添新的力证，以进一步辨明真相。

考辨类的分歧，必须坚持两原则：一、学术乃天下公器，必须坚持辨明真相、追求真理的学术目的和学术手段，而不能为辩护而辩护，更不能为了意气之争、面子之争而故意强词夺理。二、对于千百年来是学界主流意见（如《桃花溪》等三首是张旭诗），“翻”案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可靠证据，同时必须能正确、合理解释所有相反的、不利的证据，而不是要求“守”案者拿出更多证据或解释不利证据。这就好比一桩房屋产权纠纷官司，两造分别是既得产权者和争夺产权者。法官一般会要求争夺产权者举出排他性证据，而且必须合理解释所有不利证据；法官一般不会要求既得产权者解释不利证据，而是尽可能多的举证有利证据，尤其是只要能证明争夺产权者的证据不具有排他性即可赢得官司。《桃花溪》等三首是张旭诗，这是经清初学者两次著作权大辩论之后而逐渐形成的学界主流意见，朱文也承认：“仅就笔者上表有关该诗唐宋之争的不完全统计，主唐说在全部观点中占四分之三强，在清代更是达到了近五分之四的比重。”实际上，据笔者进一步统计，何止五分之四，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见，“翻”案者如果拿不出具有排他性的“坚证”，同时合理解释所有反证的话，要帮蔡襄“争夺”著作权恐非易事。

二、对朱文有关批评的答辩

其一，朱文针对笔者前作第一条“清初人对此诗的归属已有辩论和判断，莫文不应避而不提”，提出批评和“辨证”，认为：“对康熙年间学界有关此诗归属权的判定与论辩，莫先生非像李文（第一条）所述的‘只字未提’，而是言简意赅地标举出相关选家（如黄生、王士禛、‘词臣’等）与选本（如《唐诗摘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御选唐诗》等）。相对地，李文则洋洋洒洒用千余字交待了此诗引起清初诸选家青睐的来龙去脉，但列举的编者与选本都没有明显的增益。”

答曰：这实际上是“强辩”。清初人对此诗的归属有两次辩论（前一次是黄生与贺裳，后一次是阎若璩与王士禛），莫文确实没有提到，莫文提及若干选家

与选本,与笔者所谓清初人对此诗归属的两次辩论不是一回事,这叫“没有明显的增益”?要研究某一问题,必须将前人(尤其是名家)对这一问题所做过的研究或讨论作一交代,这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规范。莫文未提清初名家对此诗归属的两次辩论,而直接进入自己的论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不应该的,朱文没有必要通过偷换概念等手法来曲为回护。况且,看了朱文后,笔者重新查检,又发现早于莫文一年零四个月发表的房日晰先生的文章《漫话蔡襄的诗》,^[5]对《桃花溪》一诗的归属也有所讨论,观点与莫先生相似,而莫文也没有提及。

其二,朱文谓洪迈编辑《万首唐人绝句》为“贪多务得”,故而觉得不可靠,这基本没有超出莫文所论,笔者前作已有辩驳,此不赘述。这里主要答复朱文对笔者前作所引文献的批评。朱文云:“我们应把着眼点放在较重要的诗歌选本上,李文提及的《全芳备祖集》乃类书,可不在讨论之列。不过,李文虽‘认真检索’,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其考述不利的证据——姑且不论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的‘两属’之举(既于卷四二收录张旭《桃花溪》,又于卷一四七收录蔡襄《渡南涧》);仍以‘宋代其它文献佐证’为例,如前所述,陈思《两宋名贤小集》于卷七二就将该诗著录为蔡襄的《度南涧》。”

答曰:这段批评存在根本性错误,可能是批评者缺乏文献学知识所致。朱文所谓类书“可不在讨论之列”,大概不清楚类书的文献学价值。其实笔者前作已经阐明古人尤其是唐宋人所编类书是我们校勘、辑佚的可靠资料,并引用文献学家张舜徽“因为古人编纂类书和撰述注解时,所见到的写本或刻本时代较早,和古书的原来面目比较接近,大可依据其中所引用的文字,进行校书工作”,^[6]不知朱先生为何没有看到。为了补全这方面的知识,不妨再引几条言论。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类书类》小序中云:“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7]已故学者胡道静先生云:“古类书不但把某些专题的文献资料大体上汇集在一起,产生着‘索引’的作用,还因为它具有第一特殊作用,即保存了一批原始材料已经失传的东西,因此在古类书中能够看到的某些材料,就已置代了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可贵的。所以在祖国古代文化清理、研究的资料工作中,是不能够离开了类书来进行的。”^[8]项楚,张子开主编的教材《古典文献学》说:“类书中所收现已亡佚的古代文献,则可视作第一手材料,直接加以利用。”^[9]

至于朱文批评笔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笔者“考述不利”的两个证据:明末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及南宋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皆收录了蔡襄的《度南涧》。而事实是,关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收录蔡襄的《度南涧》,笔者前作第九条不仅有引用,还有分析。朱先生竟然没有看到,就妄称笔者回避了对自己考述不利的证据,这让人觉得是在“打黑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应该的。不过,朱文批评笔者前作没有提及南宋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也收录了蔡襄的《度南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其性质只是各位宋代名贤的个人专集汇编,其中蔡襄集应属

蔡襄别集系列中的一种,编者陈思并不知道蔡襄集中《度南涧》(即《桃花溪》)一诗存在著作权问题,所以也不存在朱文所谓陈思“主宋说”之类问题。提不提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对于考辨《度南涧》(即《桃花溪》)一诗的著作权问题基本没有影响,当然为了全面考察,最好还是提一下。这里顺便指出朱文乱引文献的问题。朱文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语“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来说明张旭《桃花溪》及杜牧《清明》二诗为伪作的可能性较大。殊不知,梁启超说的是鉴别一部图书真伪的一种方法,不是鉴别书中某个篇目真伪的方法。须了解到我们今天所知的唐诗,有数以千计的篇章是首次出现在南宋以后文献中,此问题笔者前作已有详论,兹不赘。

其三,朱文批评笔者前作对杨慎的文献成就评价过高,紧抓笔者前作中评价杨慎的一句“杨慎是公认的明代知识最广、著作最多的大学者,不太擅长理论,却最擅长考辨,其理论观点时有瑕疵,但文献上很少出问题”进行批驳,指出杨慎在文献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并引《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杨慎“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朱文对笔者的这一条批评是有理的。笔者前作“文献上很少出问题”一句确实存在对杨慎的文献成就评价偏高的问题。对杨慎文献成就的评价应当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更客观、更理性,不宜像笔者前作那样评价过高,但也不能像朱文、莫文那样对其人其作过低评价,全面怀疑。笔者前作说杨慎最擅长文献考辨,这是公允的,他实际上是明清考据学风的开创者,但由于其著述之富号称明代第一,泥沙俱下自当难免。《明史》本传说他“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10]杨慎的后辈诗人王世贞,今存著述量超过杨慎,他对杨慎的评价最切实际:“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杨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凡有援据,不妨墨守,稍涉评击,未尽输攻。”^[11]可见,王世贞也认为杨慎长于文献,短于评论。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鄙意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然往往伪造古书。”(《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稽文甫先生对杨慎的文献成就有较客观的评价:“当明朝中叶,固然是‘心学’盛行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时候,为后来清儒所大大发展的考证新风逐渐萌芽了。这里首先打开风气的要数杨升庵。升庵著《丹铅录》、《谭苑醍醐》、《古音丛目》、《古音猎要》等数十种,虽疏舛伪妄在所不免,但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自此启。”^[12]

三、朱文、莫文的核心证据与论证逻辑存在的问题

莫文的核心证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杨慎《升庵集》不可靠而王十朋编《蔡襄集》可靠,二是蔡襄的书法真迹在后世曾经多位书家鉴定,且文集、书法作品排列时间连贯。朱文没增添有价值的新证据,增添的是许多脱离客观的强辩。笔者前作已对莫文两方面证据进行详细质疑。兹对朱文、莫文的核心证据与论证逻辑存在的问题,再予辨析,以期能客观地解决疑难。

其一,朱文、莫文皆强调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一意求多,以凑足万首,所以颇有伪作混入,朱文更歪曲洪迈所编为“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为了达到百卷、万首的预期目标,洪氏不仅把当时能够网罗到的唐人绝句搜了个遍,甚至还将一些律诗从中间裁开,分成两首绝句,或者把宋诗改头换面混入其中”。所谓“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应是由上级指派的任务,而据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事实是,洪迈五十八岁这年赋闲在家,因“教稚儿诵唐人绝句”而辑得五千余首,后偶然进宫侍宴,听闻宋孝宗在宫中集得唐诗数百首用于“书扇”,于是将所集五千余首进呈,受到孝宗嘉许,四年后在会稽做官,公事闲暇又开始增补,这样断断续续进行。可见,编书完全是洪迈个人行为,宋孝宗始终没有指派什么任务。笔者据今存明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翻刻洪迈原编本统计,洪迈所编凡一百零一卷,共一万零一百三十八首,可见朱文所谓“为了达到百卷、万首的预期目标”不是事实,事实是超过百卷,超过万首;所谓“把宋诗改头换面混入其中”亦恐是想当然耳。须知此书是欲进呈圣上的,若故意作伪,那可是欺君之罪。当然由于旋录旋奏,亦未能严格按时代顺序编列,一人之诗分置几处的现象很普遍,陈振孙等人所指摘的误收宋诗的情况亦确实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洪迈故意草率、作伪,进而贬低此书的重大文献价值。关于此书的重大文献价值,笔者前作已有详细论述,此处只进一步补充说明。凡历代所编大型的总集甚至别集,无不有这样那样较为严重的问题,像最著名的胡震亨《唐音统籤》、清编《全唐诗》等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误收与重出问题,我们能因此而贬低甚至否定它们的重大文献价值吗?我们决不能曲意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出现的问题辩护,也决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贬低此书的重大文献价值。明许学夷曾中肯地评价洪迈此书对保存唐诗文献的贡献:“但其所载中唐以后之诗,今诸家集中多阙,故知今所传者多非全集。”^[13]

朱文、莫文对于杨慎其人及其《升庵集》所载其亲见崔鸿胪家藏张旭“石刻三诗”皆极力贬抑,认为杨慎作伪以后再撒谎,朱文进一步引用莫文“他所说的张旭真迹居然连诗题与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而他又是读过《万首唐人绝句》的”,再次强调杨慎所谓“石刻三诗”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所载毫无二致,应该是抄自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然后谎称亲见“石刻三诗”云云。笔者以为,朱文、莫文对于杨慎其人的贬抑太过,上文已有辨析。至于朱文、莫文认为杨慎抄自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然后再撒谎,笔者前作已有辩驳,这里再列举事实证明朱文、莫文观点实出于虚幻的想象。事实上,杨慎《升庵集》所载张旭诗本文与《万首唐人绝句》所载并不完全相同。第二首《升庵集》“春辉”,《万首唐人绝句》作“春晖”,尤其是第三首,《升庵集》“列清樽”,《万首唐人绝句》作“倒清尊”。莫先生没有细看,就草率地认为《升庵集》所载张旭诗“诗题和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并以此为前提推断杨慎抄袭后再撒谎。而朱文通过表格已列出《升庵集》和《万首唐人绝句》文本不同,却仍然引用莫文“毫无二致”云云,不惜自打耳光。这让人怀疑朱文的出发点到底是

不是为了搞清学术问题。总之,杨慎没有抄袭《万首唐人绝句》是可以确定的。说他作伪再撒谎,一定要有证据,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戴有色眼镜妄加猜测。值得注意的是,杨慎称亲自目睹唐代文物“石刻”录下三诗,尤其是细致描绘张旭字体“字画奇怪,摆云掠风”,撒谎是不容易做到的。况且,读者也会质疑:杨慎为什么要作伪、撒谎?若真是撒谎,张旭三诗既不是照抄《万首唐人绝句》,连莫先生都觉得不会抄自《蔡襄集》,那从何而来?笔者前作第九条已对文本优劣作了详细论述,兹不赘。

至于莫先生谓王十朋编《蔡襄集》“版本可靠”一证,笔者前作第二、第三条已有详细辩驳,而朱文也未再提出此证,兹不赘。不过,朱文、莫文屡次强调王十朋编《蔡襄集》比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早二十一年,也就是说三诗先见于《蔡襄集》,后见于《万首唐人绝句》,故而属蔡可能性大。此问题笔者前作第七、第八两条已有辩驳。兹再补充几句。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分辨清楚:一是《蔡襄集》与《万首唐人绝句》中的三诗只是“基本雷同”,实际上三首不仅题目全不同,每篇正文也不全相同,从文字优劣看,每篇都是明显的蔡劣张优,这不蹊跷吗?二是王十朋编《蔡襄集》比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早二十一年并不能说明三诗属蔡。因为据初步估算,有千首以上的唐诗是首次出现在《万首唐人绝句》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篇章早已被收入北宋人所编的宋人别集“善本”中。如王安石家藏“善本”《临川集》(编于北宋)就收有陆龟蒙的《丁香》,题目改为《出定力院作》,而署名陆龟蒙的《丁香》诗首见于《万首唐人绝句》中;黄庭坚外甥洪炎所编“善本”《豫章集》收有盛唐人贾至的《春思》诗,诗题改作《题小景扇》,而署名贾至的《春思》诗亦首见于《万首唐人绝句》。《临川集》与《豫章集》的编定比王十朋编《蔡襄集》早得多,所收的陆龟蒙、贾至诗照样不如《万首唐人绝句》可信。当然,二人亦有所别,王安石属于“剽窃”,黄庭坚属于“误入”,详后文。

其二,莫文、朱文提出的“力证”是蔡襄的书法真迹在后世曾经多位书家鉴定,且文集、书法作品排列时间连贯。朱文云:“而蔡襄书法作品本身的真伪,乃是判定此诗作者的基础,李文(第五条)所谓‘蔡襄书法真迹经过鉴定与《桃花溪》诗的作者之间无必然之联系’的说法不能成立。由于蔡襄对其书法颇为自惜,不肯轻易下笔,也就造成了其传世作品相对较少的情况。因此,考述蔡氏《山堂诗帖》之真伪,乃是判定此诗归属权的基本点。试想,倘若字迹本身即不真实,那么所写之内容就不得打上大大的问号了。”这段话属于明知无理而偏要狡辩。笔者前作第五条对此问题已经论述非常清楚了,书帖作品是真的,决不能证明帖中诗文的著作权就属于书写者,这个道理连初中生也不会不明白,朱文为什么仍然要强词夺理?

至于蔡襄文集中、蔡襄书帖中《十二日晚》(即张旭《春游值雨》)、《十三日吉祥院探花》等篇排列时间连贯,且《十二日晚》中有“入花园”,后面紧接着《十三日吉祥院探花》,这倒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证据”,我认为,这一条应该是

莫文、朱文唯一“有力”的证据。但是,其中也有颇值得怀疑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十二日晚》云:“欲寻轩槛倒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花园。”诗写到欲寻找亭台去豪饮,因为晚上下雨,于是想象请春风吹散雨障,好让我们明天去花园尽享宴饮之欢。可下一首《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云:“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候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第二天(即十三日)却仅写寺院(吉祥院)看花,既未提及“雨”是下还是停,也未提及“饮酒”事,前一首明明说入花园是为了去饮酒,后一首却只写寺院看花,岂不矛盾?前一首风格雄迈,后一首以及前后诸首风格优雅,岂不怪哉?这只能说明,这两首诗标题上看似连贯,内容上却毫无关联。而值得注意的是,《十三日吉祥院探花》与下一首《十三日出赵园观花》题目内容皆相关而连贯。此外,蔡襄《十二日晚》中“入花园”的“花”字,在张旭《春游值雨》中作“华”字。莫文以为“花”与“华”相通,笔者前作第九条已对此作了强有力的辩驳,认为“‘华园’即华林园,六朝时著名宫苑,故址在今南京古台城内,齐梁诸帝常宴集于此”,华林园“至赵宋时已不存”。“华园”(华林园)古来就作为雅集宴饮之所而驰名,诗的开头一句既然说欲寻“轩槛”(园林亭榭)去“倒(列)清尊”(豪饮美酒),末尾自当为“入华园”,可能因“华园”至赵宋时已不存,宋人已有不知,故误以为“华园”即“花园”。而朱文仍然沿莫文说法,反以笔者的理解“似牵强”。这让笔者感叹“解诗”不易,一些学者在研究诗歌,但未必真的“解诗”。其实,此诗中“华园”即华林园,在《御选唐诗》卷二十八张旭《春游值雨》诗下,康熙的老师陈廷敬注即云:“《世说》: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觉有濠濮间想。”^[14]可见,莫文、朱文唯一“有力”的证据也问题重重。

至于朱文最后一条,认为笔者前作所解《桃花溪》(即蔡集《度南涧》)诗中所写地点在今天的湖南省境内,显得过于武断。认为诗中应该用湖南桃花源典故,并列举蔡襄诗中其他桃花源典故例子。不知朱文是故施雾障还是真的不懂诗。《桃花溪》全诗句句在写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景色(在今湖南常德):桃花矶、桃花溪、桃花、桃源洞。陈廷敬《御选唐诗》卷二十八《桃花溪》注曰:“《一统志》:桃花山在常德府桃源县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溪。”^[15]诗中“清溪”即指桃花溪;“洞”即指桃源洞。而所谓诗歌“用典”,一般只用在诗中局部句子或词语,如朱文所列蔡襄其他五首诗中第二首末句、第三首第三句的“仙源”即是(第一首、第五首无用典痕迹),而《桃花溪》全篇都在写桃花源景色,这叫“用典”?若全篇用同一个“典”,那就不叫用典,属槩括。朱文说蔡襄在“用典”,应是诡辩。

最后,朱文的结论部分云“李文的诸多质疑皆不能成立,《度南涧》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蔡襄”,谓笔者前作对莫文所提质疑“皆不能成立”,到底谁不能成立已不言自明了。顺便一提的是,笔者曾将与莫先生论争之文呈王水照先生、陈伯海先生、杨明先生、曹旭先生、吴承学先生、刘永翔先生等先生一阅,均获得嘉许。李浩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中甚至将笔者与莫文的论争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典文学论争的两个代表性案例之一。而朱文竟在无理无据的情况下说笔者前作的所有质疑“皆不能成立”,颇令人诧异。

四、张旭《桃花溪》等三诗新证据及三诗原貌考

张旭的《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诗与蔡襄的《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三诗的正文出现雷同,直到清初才产生争论,那么,清以前文献,尤其是宋金文献对此三诗归属的记载,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笔者前作提到的宋陈景沂所编类书《全芳备祖前集》卷八收录《桃花溪》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署名“张颠”外,笔者又检得若干新证据:

其一,清顾复《平生壮观》一书^[16]收有宋高宗赵构的小楷书帖,其卷八《南宋·高宗》载:

《春江渔艇》小册,点叶树两三株似小米,重着色。双峰涌出云中,一叶轻浮溪面。小楷题云:“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以德寿殿宝盖之。《舟横野渡》小册,淡绛色,一山两峰,峰首点树三四芦苇几叶水口平分陂下横一无人舟焉。小楷题云:“水势滔滔不可量,渔舟容易泛沧浪。连山翠霭濛沙濑,白鸟翩翩下夕阳。”以德寿印及御书之宝印盖之。

宋高宗赵构所书小楷共两首诗,虽未署名,但稍加查检便知第二首为唐诗僧子兰《河梁晚望二首》之一。既然小楷两首诗的第二首为唐诗,第一首亦当为唐诗,它就是唐张旭的《山行留客》而决不可能是宋蔡襄的《入天竺山留客》,因为第三句历代所有署名张旭《山行留客》的皆作“无雨色”,历代所有署名蔡襄《入天竺山留客》的皆作“无雨过”,“无雨色”与“无雨过”虽只一字之差,涵义与水平判若云泥,笔者前作第九条已有详论,兹不赘。另据前文所引宋孝宗言及皇宮中有集唐诗以书扇的旧习,亦可作为旁证。值得注意的是,王十朋编《蔡襄集》于宋孝宗(宋高宗之子)乾道五年(1169),宋高宗书写张旭《山行留客》时,王十朋当还未编《蔡襄集》。莫文、朱文的核心证据之一谓“所谓张旭诗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事实上它早见于王十朋所编之蔡襄诗集”,已断然不能成立。

其二,金李俊民《庄靖集》卷六《集古》有《古道人》集句诗一首云:

鹤骨飘飘紫府仙 东坡,香风引到大罗天 牛僧孺。无人寂寂春山路 李群玉,洞在清溪何处边 张颠。

“洞在清溪何处边”是《桃花溪》一诗的末句,署名张颠。李俊民作为金国人,其所读书大都为北宋及以前传下来的,其《集古》120首,绝大部分是集唐诗,故此证据颇有参考价值。

其三,宋李龔《剪绡集》卷下(毛氏汲古阁景宋钞本)有《三月晦日留客》集句诗一首:

莫为轻阴便拟归,残花应逐夜风吹。共君今夜不须睡,正是王孙惆怅

时。张颠李昌符贾岛温飞卿

“莫为轻阴便拟归”是《山行留客》一诗的第二句，署名张颠。李龔是宋代浸淫唐诗颇为深广的专家，其《剪綃集》集句诗二卷，是一部专门的集唐诗集。卷上有 28 首乐府诗，卷下有 92 首七绝，全是集唐诗，是已知最早的集唐诗集。宋人看到的唐诗数量和来源比今天要更多更广，这是没有疑问的。李龔还有《梅花衲》集句诗一卷，亦多为集唐诗。李龔还编有著名的唐诗选本《唐僧弘秀集》十卷，是现存唯一一部宋人专选唐代僧诗的选本，集唐僧五十一家诗，而唐诗僧有专集行世者仅皎然、清塞、无可、贯休、齐己数家，其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全，其搜罗、保存唐诗之功可见一斑。《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采摭颇富……收拾散亡，要不能谓之无功”。^[17]因此，李龔这一证据的参考价值非同一般。

其四，明万历间黄德水、吴琯所编《唐诗纪》之“盛唐”卷四十四收有张旭《桃花溪》。吴琯在《刻唐诗纪凡例》中云：“是编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是编校订，先主宋板诸书以逮诸善本，有误斯考，可据则从。其疑仍阙，不敢臆断。”^[18]可见《唐诗纪》所收诗多用宋板原集为底本，校补以各种善本及金石遗文，故其书之文献价值可视同宋版。

此外，明黄凤池《唐诗画谱》，明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明胡震亨《唐音统笈》等，皆收有张旭《桃花溪》等诗。

总之，遍检清以前文献，除了蔡襄集系列及明末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将张旭《桃花溪》、《山行留客》与蔡襄《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并存外，再也找不到将三诗中任一首归于蔡襄的有价值的文献。也就是说，清以前有判断价值的文献，除蔡襄集系列外皆将三诗著作权归于张旭。至于清初张旭诗著作权争议产生之后的各种选本、类书文献，也是一边倒地三诗著作权归于张旭。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并选张旭、蔡襄诗，清康熙皇帝《御选唐诗》、《御选宋诗》也分别选入张旭《桃花溪》和蔡襄《度南涧》，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雷同，还是把《桃花溪》、《度南涧》看作不同的诗？顺便补充一点，朱文妄测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收入张旭《桃花溪》是“尊上”和“从众”，竟不顾康熙《御选宋诗》也选入此诗。

据《升庵集》卷五十四《张旭诗》条所云，张旭三诗是从张旭的草书石刻录下，故可视为张诗原貌。兹还原其文本如下：

《桃花矶》：隐隐飞桥隔墅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青溪何处边？

《山行留客》：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春游值雨》：欲寻轩槛列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与《万首唐人绝句》和《唐诗三百首》等通行文本比较，文字相异处，石刻三诗确实稍优。第一首，诗人立足于桃花矶，故诗题比《桃花溪》更恰。“墅烟”意

为村舍的炊烟,而“野烟”意指荒僻处的霭霭雾气,故“墅烟”更切合世外桃源生活环境。第三首,“列清樽”稍优于“倒清尊”,“列”字雅,“倒”字俗,古代有身份者宴饮有所谓“列鼎”、“列筵”等词。

张旭诗今存十首,风格幽深旷远,别有神韵,杨慎谓“清逸”,钟惺云“细润有致”:“张颠诗不多见,皆细润有致,乃知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唐诗归》卷十三)尤其是《桃花溪》、《山行留客》二首,清人黄生谓“二绝极饶风韵”(《〈载酒园诗话〉评》),孙涛以为“二绝盛称于世”(《全唐诗话续编》卷下《张旭》条)。一说张旭“不治他伎”,其实多才艺,不只工草书,亦善楷书,还善歌唱。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竹枝曲》载:“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

五、张旭、蔡襄三诗混淆原因论断

笔者前作第三条详细讨论了北宋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坛风气,就是北宋人普遍喜欢用书法手段(包括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唐诗,或原封不动或改动几个字,且常常被公开收入题写者文集,并列举宋人所编王安石、黄庭坚、李之仪等号称“善本”的文集中,改头换面收入许多唐人诗甚至唐诗名篇。其实北宋文人手书唐诗、模仿唐诗、改写唐诗、剽窃唐诗的风气在宋初王禹偁、林逋、惠崇等人那里已经开始,到南北宋之交达到高潮,有些确是出于爱好,手书其诗而“误入”文集,有些则是故意剽窃唐人诗作而为己有(如惠崇弟子讽刺惠崇剽窃司空曙、刘长卿诗),以致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痛斥道:“剽窃他人诗句以为己出,终当败露,不可不戒。如近时吴可《晚春》……但易其题曰《晚醉口占》,仍改诗中三四字而已。”^[19]其中王安石正是宋代甚至中国古代“剽窃之风”的代表人物。^[20]薛雪《一瓢诗话》曾指出:“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21]而王安石恰与蔡襄同时并有交往。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蔡襄是出于爱好,手书张旭诗而“误入”文集。但从蔡集中三诗所改标题与诗歌正文“文不对题”看,确似故意篡改前人诗为己诗,若从蔡襄将张旭《山行留客》中“无雨色”书为“无雨过”,将张旭《春游值雨》中“入华园”书为“入花园”看,稍微懂诗之人也能判断出“过”、“花”二字绝对是“点金成铁”,故我们宁愿相信蔡襄书张旭诗时误记或手书笔误。

蔡襄爱好、收藏、模仿张旭书帖是有案可稽的。北宋人董道《广川书跋》卷七载《张长史草书》张旭真迹后有跋语云:“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谟所藏张长史帖,为书其后,崇宁二年十一月壬申。”^[22]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所载《张长史四诗帖》于所引张旭诗帖后有跋语云:“张长史《缣素》四诗帖,《宣和书谱》所载,初为蔡忠惠公家藏,后入御府。”^[23]可见,蔡襄确实喜欢收藏张旭法帖。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卷三十一《学书如泝急流》载:“近年笔法,蔡君谟独步当世,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泝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处所,君谟以为:能取譬张颠以头濡墨。”^[24]谢肇淛《五杂俎》卷七载:“蔡君谟云: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然飞动非所难,难在以谨严出之

耳。”^[25]可见,蔡襄崇拜、模仿张旭亦是事实。张旭以外的唐人诗,蔡襄也爱随手题写,有时因口熟手误而写错个别字句。刘克庄《后村集》卷一百二《蔡端明书唐人诗帖》:“往往饮后口熟手误尔。”^[26]朱文亦提及“蔡襄确实和不少北宋书家一样,有随意题写唐诗的习惯”。

因此,在北宋文人手书唐诗、模仿唐诗、改写唐诗的风气之下,正因为蔡襄对于其偶像张旭诗帖的收藏、临摹、题写等行为,导致《桃花溪》等三诗“误入”蔡襄文集,三诗之作者遂致混淆,而有此一公案。明乎此,就没有必要硬为蔡襄“争夺”著作权了。

注释:

[1]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所收张旭三诗文本为:“《桃花矾》:‘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矾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山行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霏衣。’《春游值雨》:‘欲寻轩槛倒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蔡襄《端明集》所收三诗文本为:“《度南涧》:‘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矾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入天竺山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过,入云深处亦霏衣。’《十二日晚》:‘欲寻轩槛倒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花园。’”

[2]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3]李定广:《〈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学术界》2007年第5期。

[4]朱光立:《〈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学术界》2014年第6期。

[5]房日晰:《漫话蔡襄的诗》,《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3期。

[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7][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1700页。

[8]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47页。

[9]项楚、张子开:《古典文献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10]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082页。

[11]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053页。

[12]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42页。

[13]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60页。

[14][15]康熙选、陈廷敬注:《御选唐诗》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顾复:《平生壮观》,康熙三十一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有点校本。

[18]吴琯:《刻唐诗纪凡例》,明万历十三年(1585)文枢堂刻本《唐诗纪》卷首。

[1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关于北宋剽窃风气及王安石严重剽窃习气,详参李定广《王安石的剽窃习气及其成因》一文,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21]薛雪:《一瓢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09页。

[22]董迪:《广川书跋》,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1页。

[23]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2009年,第126页。

[2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责任编辑:黎虹]